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79年5月5日 星期六
农历己未年四月初十 第11257号

正当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时候，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年，具有特殊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它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从五四运动前几十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了老大帝国的门户。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威胁着“天朝”的统治。闭关自守的政策无法继续下去了，欧风美雨的袭来，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一部分顽固派死抱住封建主义不放，大喊大叫要保存“国粹”，维护孔孟之道的正统地位，顽固地拒绝一切新事物、新思想，拒绝一切外国的文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向西方寻找真理，学到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然而，旧的封建主义文化固然破灭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也证明此路不通。人们在怀疑和彷徨中。正在这时，在五四运动前两年，十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于是，先进的中国人才把眼光投向俄国，并且经过俄国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出路，那就是：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发现这条道路，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结果。当然，不是所有五四时期的人物都走上了这条道路。其中一部分人把五四精神发展到了反面，他们反对了老教条，引来了洋教条；破除了迷信，产生了新的迷信。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就是这样的代表。他认为中国一切都好，西方一切都好，公然提出中国要“全盘西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既反对了封建主义的老教条，又反对了资产阶级的洋教条，坚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上，又发生了新的偏向。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看来，走俄国人的路就意味着盲目照搬马列的书本和苏联的经验，迷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说的一切，根本不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也不需要实践的检验。这样，他们也就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它的反面，变成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曾经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种错误思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克服了。延安整风运动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革命，从根本上说，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是，历史证明，简单照搬俄国的经验也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的产物，就是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这些都是新创造，是俄国革命所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革命又是走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胜利，恰好是五四运动的三十年以后。从那时到现在，又是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后三十年的经验又进一步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要走自己的路。

在建国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们唯一的榜样是苏联，要学习苏联，这是肯定的。但是怎样学？是盲目照搬，还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这个问题，又是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一九五六年，我们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年，毛泽东同志写了《论十大关系》，其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还专门写了“中国和外国关系”这一节，全面地论述了学习外国的问题。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和《论十大关系》一起，都是吸收了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可以说，从一九五六年起，我们就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个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方面，苏联的经验那些是正确的，适合我国情况的，那些是不正确的，不适合我国情况的，这需要根据比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才能辨别。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国家还处于被封锁的地位，我们还没有机会广泛接触外国的实际，多方面寻求知识。因此，有许多事情，我们只能强调自己去创造经验，加上一些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就免不了走一些弯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林彪、“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愚民政策和现代迷信。他们一面把马列



社论 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处生产建设的第一线，他们最有实践经验，最了解情况。党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研究群众的经验，据以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再反过来把路线、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要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和创造。我们讲发扬民主，当然是指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民主千百万倍的民主。应当承认，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不完善。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是一个过程，要一步一步来，但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朝这个方向前进。要实现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历史任务，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它指导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在新的长征中，我们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在它的指导下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有的勇气去打破一些陈旧的框框，改变一些陈旧的观念。解放思想是为了寻求真理，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因此，解放思想应当是和实事求是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理论都来自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内。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我们都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错误的，我们都要修正。这是最彻底的科学态度。五四运动到现在的大约六十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过程。

五四运动时期，我国青年发挥了先锋作用。六十年来的，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青年在长期斗争中继承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对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期待青年同志在新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发挥突击队的精神。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精神，奋勇前进！

华总理会见侯赛因总理

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在我们这一地区的侵略和扩张，是符合中国和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的

新华社北京五月四日电 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奥恩时强调说：反对霸权主义在我们这一地区的侵略和扩张，是符合中国和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的。

华总理在谈话中赞赏东盟国家为解决印支问题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的提案。他说：“我们要团结起来打破霸权主义在我们地区的侵略扩张的部署。当前，东南亚是不是能有和平和稳定，焦点集中在柬埔寨问题上。”

侯赛因总理对华总理说：“我们同你们一样，非常关心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

当谈到中马两国关系时，华总理指出，马来西亚

贵宾在北京同我们举行了很好的会谈。会谈的结果表明，中马两国的关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他说：“侯赛因总理的这次来访必将对增进中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很大的贡献。”

华总理还向马来西亚贵宾介绍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

参加谈话的马来西亚贵宾有：外交部长东古·艾哈迈德·里陶丁，工程和公用事业部长达图·李三春，运输部长坦·斯里·马尼卡华沙甘，沙捞越州副首席部长达图·东斯坦·恩达维，沙巴州副首席部长达图·詹姆斯·翁基利，外交部秘书长坦·斯里·扎卡里亚·阿里，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达图·阿卜杜·拉赫曼·贾拉尔等。

谈话时在座的有：我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仲曦东，外贸部副部长贾石，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叶成章等。

谈话后，华国锋总理同马来西亚贵宾一起照了像。侯赛因总理的夫人、已故拉扎克总理的夫人等也参加了照像。

华国锋总理会见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奥恩和夫人以及随同访问的其他马来西亚贵宾。

新华社记者摄

邓副总理同侯赛因总理会谈

双方就发展两国友好交往和合作关系交换意见

新华社北京五月四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奥恩以及双方有关人员，今天上午举行了有关三春、运输部长坦·斯里·马尼卡华沙甘，沙捞越州

副首席部长达图·东斯坦·恩达维，沙巴州副首席部长达图·詹姆斯·翁基利，外交部秘书长坦·斯里·扎卡里亚·阿里，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达图·阿卜杜·拉赫曼·贾拉尔，内

五届政协常委会举行三次会议

乌兰夫副主席主持 张海峰副外长作关于国际形势报告

新华社北京五月四日电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在政协礼堂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由政协副主席乌兰夫主持，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将继续举行。

把思想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对待学生提出的问题

本报讯 中共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引导学生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把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促进了学校的安定团结。

前一个时期，师范学院思想活跃，提出了种种问题。院党委对此不是回避，而是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情况，掌握各种思想动向，分别不同情况加以正确引导，并对实际问题作出妥善处理。

第一，对要求合理，方法对头的，就热情支持，切实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去年十一月，上海师院刚恢复不久，在教学和后勤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学生纷纷来信，“呼吁”党委解决。当时，学院正在召开团代会和学代会。一部分学生要求修改原定的会议议程，增加揭露学院工作中的矛盾的内容。院党委经过研究，认为这一要求是合理的，决定增加一天议程让大家提意见。院党委和各部、处、系负责人都到会听取意见。会后，党委把这些意见进行整理，交给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院党委书记和总务处长、团委书记一起到学生最多的食堂蹲点，做思想工作，调动炊事员的积极性，改进伙食。学院还建立了伙食民主管理委员会，协助食堂工作。上学期间期末考试时，食堂增添夜餐，为学生提供方便。学期结束时，院学生会组织学生到食堂慰问炊事员，使原来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对要求合理，但方法不对头的，院党委在指出方法不对头的同时，认真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这个学校有一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原是民办学校的教师，多数已经结婚，生活确实有困难。当社会上少数人闹事时，他们也成立了串联会，并准备走出学院去串联，然后到

市革委会去。党委及时了解了这个情况后，主要负责同志到这部分学生中去工作，指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妥，不仅问题难以解决，还要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全市的安定团结。同时，学校也通过正常的渠道，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反映这些学生的实际困难。对这部分学生的实际困难，院党委考虑安排有报酬的勤工俭学劳动予以解决，防止了事态的扩大。

第三，对要求不合理，方法不对头的，院党委旗帜鲜明地坚决制止，讲话不留余地，但工作做得细。今年二月，中文系专科（二年制）部分学生提出了转本科（四年制）的要求，还串联了其它系的学生近千名，酝酿召开全院专科生大会，通过“决议”，向市革委会“请愿”。针对这一情况，院党委向有关的党总支书记、系主任、辅导员等做工作。院党委表示，这种要求不顾国家计划，是无法达到不合理的。党委负责同志还找了其中的党员骨干谈话，指出事态扩大的危害性，发动他们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对于专科生上的合理要求，则采取具体措施，加强教学力量，引导大家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由于院党委旗帜鲜明，工作及时细致，问题得到了解决，专科生没有停一堂课，学习情绪稳定，学习热情越来越高。

云南锡业公司采取多种形式

组织职工学文化学技术学管理

据新华社昆明四月三十日电 云南锡业公司采取多种形式，广泛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学文化、学技术、学管理知识，帮助他们尽快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这个公司已组织了二十个专业的技术培训班，

这些培训班包括冶炼、采矿、选矿、地质、建筑、生产管理和外语等，共一百一十期，先后有一万多名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学习。

锡业公司组织职工学习是根据不同对象，因人而异，有的利用业余时间，有的是短期脱产学习。例如公司一级机关举办了生

产管理学习班，主要是组织处级以上干部利用业余时间，结合矿山实际学习有关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企业管理企业的水平。湖北山采选厂去年招收了一批新工人，厂里就组织技术工人到工厂讲课，同时派老工人到现场进行实际操作，帮助他们弄懂设备的构造，掌握操作技术。

择优供应原材料形成有力协作线

广东省农机生产部门今年以来手扶拖拉机产量、质量上升，经济效果明显，开始改变长期被动落后的局面

新华社广州五月一日电 广东省农机生产部门按照择优选点定产、择优供应原材料的原则，组织安排手扶拖拉机的生产，已经收到良好的经济效果。今年第一季度，广东省生产的工农—12型拖拉机，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质量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原材料节约，成本下降。四月份以来，拖拉机产量、质量继续上升，经济效果越来越明显，生产长期被动落后的局面开始得到好转。

广东省各地有九个拖拉机和农械厂生产手扶拖拉机。过去，每年分配生产任务时，都是采取开“大锅饭”的办法，让各家都吃一点。但是，由于这些工厂大部分是仓促建成的，设备落后，工艺水平较低，技术力量不足，所以生产的拖拉机多半质量差，消耗原材料多，成本高，严重地影响了支农效果，也给工厂本身造成亏损，生产愈多，亏损愈大。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状况，广东省第一机械工业局在安排今年手扶拖拉机生产任务时，决定按照择优供应原材料的原则，选定设备较先进、工艺水平较高、技术力量较强、产品质量较好的新会农械厂作为重点厂，把全省百分之八十的任务交给这个厂。其余的厂，除继续承担少量拖拉机生产任务外，准备转产搞另外一些支农产品。与此同时，对于手扶拖拉机所需

的柴油机、齿轮、油泵柴油嘴等配套产品，也按同样原则选定由顺德农机修造厂、韶关齿轮厂、韶关油泵柴油嘴厂、肇庆齿轮厂、和平配件厂、新会铸造厂等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生产，形成了一条强有力的生产协作线。

这批工厂接受生产任务后，都相应地采取措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决心把手扶拖拉机的生产搞得更好。新会农械厂加强了质量检查工作，对本厂产品和原材料的产品，件件都进行精细的检查或试验，不合格的坚决不装配。顺德农机修造厂把厂各条生产流水线都进行了调整，使生产过程更加科学合理。

为支持上述工厂把手扶拖拉机的生产搞好，省有关部门在电力、燃料等方面，也尽可能保证供应。

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实行择优选点定产、择优供应原材料的做法，好处很多。首先是，能够使有限的原材料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用同样数量的东西制造出更多的产品，把钢用在刀刃上；其次是，择优厂的产品质量，过去就比较，现在把任务集中在这些厂，更能促使他们精益求精；第三，工业领导部门能更好地掌握所属企业的设备潜力，研究确定各工厂今后的发展方向，便于进一步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协作。

鞍山钟表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 改变厂风推动生产

据新华社沈阳五月三日电 鞍山钟表厂开展为四个现代化合理化建议的活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效地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

从去年五月份以来，全厂一千一百多名职工共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三千三百多项，内容包括改进企业管理、改进生产技术、加强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等方面。这些合理化建议，目前绝大部分

已经得到落实和处理，对推动全厂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过去他们加工闹钟的摆轮，都是用手工操作，效率低，质量还没有保证。去年，机械加工车间工人栗德福提出了改用机械加工的合理化建议，并试制成功一台摆轮精车自动床，使摆轮加工摆脱了落后的手工操作，生产效率比过去提高三倍，一级品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合理化建议活动的深入开展，不仅推动了全厂生产的发展，而且使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全厂计较个人得失的人越来越少了，考虑如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的人越来越多了；在业余时间打打闹闹的人越来越少了，钻研技术和管理的人越来越多了；工作中互相扯皮、相互推诿的人越来越少了，团结互助、协力攻关的人越来越多。职工们高兴地说：合理化

建议活动真是好，促进了生产，又改变了厂的风气。

他们还把本厂一些管理和生产技术上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经常向群众交底，引导大家围绕这些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例如，这个厂的物资管理工作一直比较落后，常常造成积压和浪费。厂里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张榜招贤”，结果在很短时间里，提出五十多条建议。现在，全厂物资管理工作已经有了很大改进。

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活动开展以后，这个厂又建立了必要的奖励制度。他们规定，根据其创造价值的大小，及时给以适当的表彰和奖励。

三十个春天

祖国的北方，春光明媚。在这里战斗的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马恒昌小组，迎来了她的第三十个春天。

三十年前的春天，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马恒昌小组在隆隆的炮声中诞生了。由十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创立的全国工业战线上第一个模范生产小组，象一株挺拔的松柏，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茁壮地成长。三十年来，有三百名工人在这里工作过。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史书写了光辉的一笔。在第三十个春天到来时，马恒昌小组全体同志兴奋而庄重地向祖国汇报：

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七九年四月，这个加工精密机床的车工组，按每年的定额累计计算，共完成了四十五年零三个月的工作量；产品合格率一直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九点四以上；学习和运用外国先进技术一百零九项，实现技术革新八百四十多项，有的项目提高工效十多倍；为国家节约资金一百九十多万元，实现了优质、高产、低耗、多积累。

这期间，全组共培养和输送了二百多名技术工人和科级以上的管理干部。十三任组长中，有十二名是全国和省、市的劳动模范。第一任组长马恒昌，是全国五届人大常委，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党委副书记、总机械师。去年八月，在全国机械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这个小组被命名为“三大革命斗争的英雄集体”，华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这个小组的十三任组长。

马恒昌小组为什么有取得这样突出的成绩呢？根本的一条，是他们有着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创建这个小组的十名老工人从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新中国比旧社会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参加中国。因而，他们以当家作主的态度，自觉地参加企业管理。这个好传统一直被后来的组员继承下来。经过

做现代化的主人——记马恒昌小组

三十年的不断完善，他们创立了一整套班组管理的经验。他们特别注意坚持三大革命一起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落实到生产上，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使大家树立了为发展祖国的工业而献身的理想，形成勇挑重担、敢攀高峰的战斗风格，顾全大局、互帮互学的集体主义精神，严格要求、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正是有了这些，才保证了小组年年季超额完成国家计划，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新的考验

英雄的马恒昌小组走过了三十年光荣的战斗历程。今天，这个小组的阵容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老组员一茬一茬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接班的是青年一代。在现有的二十四名组员中，有二十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进组的，其中七人是去年才进厂的。全组工人平均年龄二十六岁。去年五月，厂里根据生产需要，将马恒昌小组迁到锻压机中作车间。这样，他们加工的零部件，比过去复杂了，材质型号和工具、卡具、量具的种类也都增多了。面临着新人、新设备、新任务，马恒昌小组能不能经得住考验？领导和群众都期待着他们的答复。

面对这些困难，小组首先坚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请老组员讲述小组三十年的革命传统，召开了建组以来最大的一次新老组员座谈会，回顾小组的光荣历史。大家说：我们第一代老组员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克服加工中的困难，胜利地完成了许多技术要求比较高的重要任务。现在再有困难，也比第一代老组员那个时候好。只要我们能发扬勇挑重担、敢攀高峰的优良传统，就一定能够闯过难关，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在攻关过程中，小组又及时解决新出现的思想问题。有一名青年工人干活时，没有看懂图纸，把一根长料当短料加工了；又一次由于没有掌握好量具，报废了一件活。他怕小组的荣誉受影响，十分着急，失去了搞好工作的信心。小组负责人帮助他找原因，既批评了他的马虎大意，又帮助他提高认识，增强信心。他很受感动。此后一连好多天，他早晨四点就来到车间学习看图，练习使用量具卡具，熟悉车床性能，晚上八九点还不肯回去。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勤学苦练，他终于掌握了新的加工技术，后来加工的产品全部合格。

在小组的光荣传统鼓舞下，全组同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闯过了道道难关，去年提前三个月完成了生产计划。

今年第一季度，他们遇到了电力不足的困难，全组因停电累计停产八五十多个小时。但是，全组工人干劲未减，情绪未落，纪律未松，仍坚持每天提前上班，做好生产准备。他们提出

向二〇〇〇年前进

去年十一月份，马恒昌小组全体队员冒着凛冽的寒风，第十次来到大庆。在高的钻塔下，在一座座采油井旁，学习大庆工人的英雄事迹。回到工厂后，他们对照大庆工人的事迹，用科学的态度严格检查自己，深感受搞四化，必须继续发扬大胆、苦干、实干的精神，踏踏实实做好工作，改变现有条件。

目前，小组成员的文化技术水平低。二十四名组员，一般只有初中、高小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平均不到二级半，只能操纵四五十年代的设备；班组管理也不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他们专门制订了全组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的规划。

按照规划，全组每周固定抽出三个业余时间上课，请厂里的技术人员讲解机械识图与制图、基础数学、英语等课程。大家学习劲头很足，除了出差、休假和探亲外，一般都能按时完成作业。副组长王振俊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读大部头的技术书籍有困难，但他没有退缩，经常学习到深夜；遇到疑难问题，就虚心向人求教，直到弄懂才罢休。到去年底，全组已经学完了机械识图与制图两门课程。

为了提高操作技术，他们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开展了岗位练兵。全组通过讲技术课、以老带新、技术互助、技术表演等传统方式，做到一人技术有专长，大家来学习；一人技术有困难，大家来帮助。最近，他们在三台机床上安装了数码显示装置，并通过现场讲技术课和操作表演，初步掌握了数码显示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从而减少了辅助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多年来，马恒昌小组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班组管理制度。在向现代化进军中，他们一方面巩固原有的管理制度，教育青年工人熟悉它、执行它。另一方面，认真学习国内实行全面质量管理试点经验，结合本组生产特点，制订出开展全面质量管理的具体计划。他们先后进行了四次课，分析了本组加工零件的特点，对过去的废品作了统计分析，查出数据，画出排列图，召开会议，找出出废品的主要原因，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改革。在这基础上，制订了新的操作规程，使小组的产品质量又有新的提高。

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马恒昌小组目前正在开展“向二〇〇〇年进军”劳动竞赛，决心为国家 and 人民再立新功。

前进吧，英雄的团队！

前进吧，现代化的主人！

新华社通讯员 朱石川
《黑龙江日报》记者 宋显忠
新华社记者 王德华

既加强责任制 又稳定所有制

浙江省宁波地区农办副主任 钟伯荣

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充分发动农村干部和社员积极性，集中力量搞生产，是头等大事。但是，近来农村还在就生产责任制问题议论纷纷：一是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与包产到组（或称生产到组）是否一回事？二是它与分小小队（即以包工到组为名，即以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有什么区别？这是急需弄清楚的问题，以便安定团结搞好事。

前几天，我到鄞县甲村公社甲村大队作调查。这个大队的十四个生产队，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开始，分为四十八个作业组，实行土地、劳力分组操作，年终结产、节本奖励工分的生产责任制（中间因挨批判，停止了两年）。他们坚持了生产资料归队所有，由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并且对全队的生产建设，统一计划、统一布局、统一要求。这样做，核算明确，责任落实，赏罚分明，方法简单，既调动了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又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促进了增产增收。

这个大队一九七八年粮食平均亩产上升到一千六百三十七斤，比上年增加六百多斤，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二百五十五元。现在，甲村大队的经验已在全公社推广。

从甲村大队来看，他们的做法，符合新“六十条”关于“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规定。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环节要注意，就是看如何实行奖励：如果实行超产奖工，就不会影响生产队的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统一核算、统一奖赏，就有可能使作业组成为事实上的一级核算单位。因此，我们不能反对包产到小队、分到组。它与分小小队搞独立核算，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

那么，应当怎样才能做到既加强责任制，又稳定所有制呢？我认为应该弄明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要从有利于稳定所有制、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出发，来建立生产责任制。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分小组作；坚持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超产奖工，承认差别，不搞全奖全赔、实奖实赔。

第二，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单位，必须始终坚持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所有，土地、小农具、耕牛相对固定到操作组使用和管理；坚持生产队统一计划、统一生产布局，分小组作；坚持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超产奖工，承认差别，不搞全奖全赔、实奖实赔。

第三，有些生产队因为规模过大、居住分散，不利于统一领导等等，干部和社员要求分队。对此要作具体分析，采取慎重的态度和有效的措施妥善解决。个别地方把按照政策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作业组，也当作分队行取消，都是不对的。

分清是非 敢于领导

中共福建省委闽清县委书记 戴永善

我们闽清县是深受林彪、“四人帮”祸害的重灾区之一。深入揭批“四人帮”极左路线以后，被认为是宣传和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关于发展农业问题的三中全会文件以来，农村安定团结，经济活跃，春耕生产比往年搞得又快又好。这些都为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的关键是各级领导必须解放思想，分清是非，敢于领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们闽清县委在这方面有三点体会：

一、解放思想，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一段，有的同志片面地认为，现在政策“松了、宽了、软了”，对一些地方闹分闹、闹分田单干的歪风，听之任之。我们县委很快抓住这个苗头，教育各级干部认清解放思想，是要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断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县出现过一些分田单干现象，集体经济受到严重损伤，生产下降。这两年纠正过来了，粮食生产迅速上升，两年增长近六千万斤，超过了一九七五年前的十年增产量，显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现在绝不可能重蹈覆辙。况且我县现有生产队的规模不大，比较适合，有利于生产发展，应该稳定。为了帮助干部、群众分清是非界限，组织他们学习政策，并联系实际事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白樟下炉大队有十五个生产队分成三十七个“包产组”，搞四级核算，使得许多社员不能安心搞春耕生产。公社党委立即领导他们纠正了错误的做法，并帮助搞“三定一奖”、“一年早知道”，建立生产责任制，推动了春耕生产。县委抓住这个典型，通报全县，及时解决了分队、分田单干的问题。

二、发扬民主，要坚持反对无政府主义。二月中旬，有个别社队工厂的少数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借发扬民主的机会，擅离生产工作岗位四处串连，进城闹事，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当时，有些同志怕有碍“发扬民主”，不敢管。县委认识到，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是辩证的统一，讲民主不能否定集中，讲自由不能不约束纪律，不能离开我们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所谓讲民主自由，那是闹无政府主义，有碍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于是，全县立即大张旗鼓宣传三

中全会公报和中央关于安定团结的文件，发动各级干部群众一齐动手作政治思想工作，动员进城的少数人返回工作岗位。对于其中确有困难的，符合政策规定并具备条件的，就帮助解决；有些问题一时不具备条件，就做过细的说理教育工作，要他们顾大局向前看；对那些为首无理取闹的人，给予了批评教育，他们也作了自我批评。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分清了发扬民主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一些同志是非界限清楚了，敢于领导，敢于解决问题了。金沙公社认真宣传和执行《森林法》，严肃处理了一起山林火灾的事件。一些地方也坚决刹住了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聚众赌博、封建迷信等歪风邪气。

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坚持党的领导。开始，全县落实今年农业生产计划时，早稻种植计划面积和国家计划指标相差较大，有人觉得左右为难。后来经过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反复讨论，讲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按比例、有计划发展的，只要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则，各生产队要从全局出发，自觉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这样一来，全县早稻面积、经济作物面积都比往年落实得好。这个事实说明，我们领导的责任，既向国家负责，又向人民负责，二者是一致的。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不是不要国家计划指导；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领导社员群众正确行使自主权，齐心协力把农业生产尽快搞上去。

为什么出现分队现象？

安徽大学宿县地区师专班 张世俊

在我们安徽砀山县，我所知道的有的生产队的分队情况：把土地、牲口、农具、耕牛一律分开，各各组各选组长、会计、记工员、保管员，各行其是，队委会等取消了。这样的“分队”和分队何异？

现在为分出现了分队的现象呢？原因很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有的农村经济政策不落实，按劳取酬原则不兑现。有的生产队存在账目不公开，财务不民主，多劳不多得，同工不同酬等现象，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致使生产搞不下去，生活水平不能提高。有人觉得“粘在一起只能挨饿”，分开也许好些。

二、群众缺少民主权利。有的



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夕，我们阅读了“五四”时期周恩来同志在天津的革命活动的有关史料。历史证明：当年的周恩来同志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反帝反封建的先锋战士，是一名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具有伟大共产主义思想的杰出革命战士。

“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在“山雨欲来”的一九一九年四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从日本毅然弃学归来，回到了离别一年半的祖国，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天津南开学校。他回到母校，老师和同学都格外高兴。“敬业乐群会”举行了盛大的茶话会，热烈欢迎自己的前会长。

点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爱国学生首先奋起斗争，点燃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焰，烈火很快燃遍全国。五日，天津的报纸闪电般地把消息传遍全市。七日，天津学生举行了示威，并先后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这两个爱国团体的推动下，以天津南开学校和直隶女师的学生为骨干力量，天津市的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力地支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每天从天津河北区住处，徒步十余里来到母校，组织在校同学并联络已毕业的校友参加爱国斗争。当时，南开学校董事长，为创办南开大学筹措经费，不惜拉拢日派、卖国贼曹汝霖出任校长，以换取他的美国捐款来资助学校；曹汝霖也想借此收买人心，以维持其岌岌可危的反动地位。周恩来同志立即团结同学，无情地揭露和反对这种可耻行为，使曹汝霖的阴谋未能得逞。这场斗争的胜利，对鼓舞天津学生坚持爱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当时刚从日本归国，不是在校学生，未能担任学生联的领导工作。但是，由于他的先进思想和革命斗争的智慧与魄力，使他在实际斗争中成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天津学联的负责人经常拜访周恩来同志，研究如何领导好学生爱国运动。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一九年五月间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说：“我是现在飞到南开去的……南开校内的学生都可造就，并且极有热心毅力”。他曾在南开学校食堂召开茶话会，代表南开学校留日同学对在校同学进行慰问，“以表爱慕之心”。并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吾人作事乃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的斗争策略，对指导当时的爱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

据日销万份的《南开日报》记载，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学生万人罢课，轰动全国。六月九日上午十一时，全市中学以上的学生几千人，集合在南开学校大操场，举行“爱国宣誓大会”。北洋军警数百人持枪包围，如临大敌，妄想借机挑动叛乱。面对这种紧张局面，一些好心的社会人士前来劝阻。大会要不要开下去？能不能开下去？人们都在为此而担心。“以表爱慕之心”的青年，走向操场临时用六个大方桌搭成的讲台。“周恩来！人们惊喜地加地活跃起来。周恩来同志登上讲台，沉着地指挥队伍，迅速稳定了会场秩序，同时发表演说，和大家一起高声宣誓：一、誓保国土；二、誓挽国权；三、誓雪国耻；四、誓除国贼；五、誓共安危。大会群情沸腾，斗志昂扬，粉碎了反动军警妄想破坏大会的阴谋。

●*****●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许德珩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到今天已经六十年了。这个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和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它有力地唤醒了中国人民，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六十年来，经过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反复较量，我们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可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更是可爱。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走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用更多的年代所走过的路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当前，在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正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是一代伟人和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是全国各族人民迫切期望。在这伟大的转变关头，我们纪念“五四”这个光辉节日，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纪元——群众觉醒的对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新纪元。俄国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大影响，就是促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它出兵占领山东半岛；强迫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亡国的“二十一条”；大量借款给中国反动政府，挑起连绵不断

反帝反封建的青年先锋

——记周恩来同志“五四”时期在天津的革命活动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反动政府拘留了天津各界第二次赴京请愿的二十五名代表。在天津的周恩来同志对全市各爱国团体的领导人说：“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营救被捕代表，是我们的责任”！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和学生代表郭隆真等，亲自到了北京，动员几千学生，包围了总统府。在广大群众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八月三十日释放了被捕的全体代表。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南开学校成立了大学班（一九二三年改称南开大学），周恩来同志入学后不久，就公开参加了天津市学联的领导工作，出色地领导了三次重大斗争。一是十月十日，周恩来同志等领导天津各界群众上万人南开学校操场举行集会，纪念辛亥革命八周年，会后冲破北洋军警的包围，到警厅门前示威游。周恩来同志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中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起草了《天津学生短期停课宣言》，这是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第一次用白话文写的宣言。二是十二月间，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开枪打死我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周恩来同志等领导全市数万爱国群众举行大示威。示威群众在南开操场举行国民大会，当场焚毁了被没收的日货，声援福州学生的爱国斗争，使抵制日货运动掀起了新的浪潮。三是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震动一时的天津“一二·九”斗争。在全市各界抵制日货运动深入开来的时候，一九二〇年一月下旬，发生了鲧发成洋庄的好奸勾结日本浪人和警察厅，殴打、逮捕各界爱国人士和封闭各团体事件。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学生骨干秘密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即将同反动派展开的大搏斗。周恩来同志坚定地指出：“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经过周密部署，决定在一月二十九日举行全市学生大请愿，包围省公署。为了避免北洋军警的追捕，周恩来同志事先巧妙地指挥学生们分散隐蔽在路旁，一声令下，立即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演讲，散发传单，口号声响彻云霄。在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学生代表的带领下，各路人马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请愿大军，冲向省公署，象一股奔腾而下的激流势不可当，大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威风，成为“五四”时期天津青年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

一九一九年七月份，天津学生爱国运动进入高潮时，周恩来同志提出通过传播新思想来推动运动走向新高潮的两把“利器”。一是演讲，一是报纸。他指出，这样就能“求社会同情”。在同学们的推选下，周恩来同志挑起筹组《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重担。邓颖超同志负责演讲部部长。七月十二日，周恩来同志写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提出，“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革心”，“革新”，提高觉悟。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周恩来同志又以《“革心”“革新”》为题写了社论。《学联报》内容

分主张、要闻、时评、评论、讨论、来件、演说、外论等十多个栏目，观点鲜明，战斗性强，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周恩来同志既是主笔、记者、撰稿人，也是经理、校对、卖报人。在天津南市崇业大街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屋里，他和南开同学潘世纶一起，不分昼夜地工作。学联报初为三日刊，后改为日刊，日销数千份，影响全国。反动当局闻丧胆，于九月二十二日起下令封禁，但在广大群众的抗议下，他们又不得不收回成命。十月七日，《学联报》胜利复刊。这个刊物还出了一百七十期，其宣传重点，除了介绍新思潮外，还号召打倒军阀，打倒旧伦常，打倒孔家店和批判孔孟之道。

一九二〇年春，在天津“一二·九”运动中，周恩来同志等二十多人被捕入狱。据当时狱中难友的回亿，周恩来同志在狱中自觉地承担了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任务，倡导、组织、筹划各项工作。据《检厅日录》记载，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前夕，周恩来同志一连两个晚上，系统地向难友们报告青岛问题始末，强烈地激发了难友们的爱国热情，使大家更加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斗争是与挽救祖国的危亡联系在一起的。从五月二十八日起，周恩来同志开始在狱中向难友系统地宣传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在那晚间的全体会上，他开始讲“马克思主义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主义说”。三十一日晚，他继续讲“马克思主义说，唯物史观”。六月二日晚，他又讲“马克思主义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斗争说”。四日晚，他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七日晚，他进行最后一讲“马克思主义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阶级中说》”。在牢房昏暗的灯光下，周恩来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照亮了难友的心。

“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

“五四”时期，周恩来同志在抓好宣传工作的同时，十分注意组织工作。他同其他青年领袖一起总结了五个月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领导学生运动的核心，作为运动的中坚，指导统一行动，巩固革命力量。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两点，在草厂庵学生联合会的公室里，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派代表二十人，举行第一次会议。男生代表有周恩来、马骏、潘世纶等十人，女生代表有郭隆真、邓颖超等十人。那时邓颖超同志只有十六岁，是最年轻的一员。会议决定：一、成立新团体，定名“觉悟社”；二、出版刊物《觉悟》；三、提倡“革心”“革新”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四、灌输世界新思潮；五、严密组织，采取委员制，发展会员应严格审查。这样，一个崭新的学生革命团体诞生了。“觉悟社”虽未明确指定主要召集人，但由于周恩来同志具有的优秀思想品质和杰出的工作能力，他在实际上成为“觉悟社”的领导人。

“觉悟社”的诞生，使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由于各学校进步学生团体的核心人物都成为“觉悟社”成员，这就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觉悟社”还大力提倡认真读书和研究的风气，并经常请革命人士、大学教授、社会名流来演讲，增长会员的知

识。九月二十一日，李大钊同志应邀来津，他称赞会员的革命精神，鼓励青年要研究新思想，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一九二〇年一月，“觉悟社”的刊物《觉悟》创刊了。周恩来同志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他为刊物编撰了许多文章。经过会员热烈讨论，由周恩来同志执笔写成的《“觉悟”的宣言》是一篇斗争纲领。宣言说，“‘觉悟’的声浪，冲击着中国知识分子，要革命，要觉悟。革谁的命？要革‘军阀主义，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命，要革‘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的命。怎样觉悟？要‘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十种精神，去完成‘‘思想改造’事业’。为此，就要‘灌输世界新思潮’。”“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

觉悟，觉醒，速醒，猛醒，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的人们思想大转变的特点；是从学西方、学日本、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到学俄国、学马克思主义、建设一个工人阶级的人民和伟大的大转变。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曾热烈欢呼世界劳工的胜利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号召大家要迎接世界新思潮，要觉悟起来。周恩来同志创建的“觉悟社”响应这个号召，引导会员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自己更是认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使得他在留日期间已经开始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更加丰富起来，紧紧地结合国情得到不断的提高，使“觉悟社”的活动更加活跃，更加为广大群众所欢迎。“觉悟社”成立仅三个月，其声誉就传播全国，成为全国最早的学生革命团体之一。当年北京的《晨报》赞道：“‘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是天津学界中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团体’。周恩来同志创建的‘觉悟社’，配合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新民学会’，在指导青年运动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新民学会’提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口号，‘觉悟社’提出了‘解放改造’的口号，这两个口号汇集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有力地推动了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出发之后，“觉悟社”邀请北京“少年中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四个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分别发表了演说，李大钊同志致词与会，共同倡议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彻底改造中国。会上还制订了《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决心在“改造中国的旗帜下，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共同战斗，提出了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是：“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切实去做点事”。

周恩来同志“五四”时期的光辉革命实践，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鼓舞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

本报通讯员 王庆民 本报记者 虞锡

*****●

国性的学生团体了。

为了加强联系，加紧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学生救国会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出版了一个刊物《国民杂志》，经费是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的，一共筹集了一千五百多元。这个刊物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反卖国贼，不谈文学革命。担任编委的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陈宝镗、陈钟凡、马骏、许德珩等，并请李大钊同志来指导。“五四”前三个月，李大钊同志就在二月十三日的《国民杂志》上，用大号字指出：“日本人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否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把要求到来的五四运动带进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认识。

当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蛮横践踏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消息传来时，北京的《每周评论》就不间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卖国贼的罪行。学生救国会、少年中国学会，以及新潮社的部分负责人，也经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讨论青岛问题。及至我们在会上完全失败的的消息传来，人们的愤慨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尽管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中国何处去这一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在李大钊同志推动下，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方面，大家则团结一致，形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就如火山一样地爆发起来了。

二

一九一九年四月，在北京传播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要求完全遭到拒绝的消息，燃起了青年学生们的怒火。当时，大家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内在勾结，但是粗略地从历史上看出：没有内奸引不进外敌。袁世凯想作皇帝，才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又都和列强相勾结，军阀段祺瑞更是个亲日派，野心勃勃，妄图统治全国。客观的事实教育了人们，军阀卖国贼是内奸，是甘心作列强的奴才，是出卖祖国的

凶恶敌人。

五月二日，我从蔡元培校长那里听到，巴黎和会要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益，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这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大家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于是开会，决定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共三千多人，冲破北洋军阀政府的阻挠和压制，齐集天安门，召开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尖锐地揭露了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背公理而逞强权”的强盗行径，呼吁人们要以“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慨”。大会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会后，群众游行，走到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并向日本使领馆示威。以后到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住宅时，群众的情怒达到极点，痛打了正在曹宅吃茶的卖国贼章宗祥。一位同学见到曹贼昏迷于平榻里，一怒之下点燃了绿色罗帐，一时大火熊熊，烈焰冲天。至此，斗争进入了高潮。

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获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同情和积极支援，但却遭到了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无理镇压。就在“五四”当天，反动政府逮捕学生三十一人、市民一人，共三十二人。我和易克崑等均受到侮辱，并被逮捕。到五月七日，反动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方面，大家则团结一致，形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就如火山一样地爆发起来了。

学生释放后，反动军阀政府明令嘉奖曹、章、陆，免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务，并要惩罚为首的學生，进行反扑，激起学生极大的愤慨。“五四”以后，一个月内，北京大专学校的学生多次罢课示威，到街头演讲，禁止日货，要求惩办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五月十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布罢课。反动政府指責学生此种行为是“扰乱滋事，扰乱治安”，限令三天内一律上课。学生断然拒绝，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商讨对策，被军警重重包围。会上决定扩大运动，推出代表南下联络，呼吁援助，扩大声势。因三院会场已被包围，我们遂逃出会场，化装出京。（下转第四版）

侯赛因总理和夫人出席文艺晚会

欣赏了我国的音乐、舞蹈和传统京剧节目

新华社北京五月四日电 侯赛因总理和夫人今晚出席了文化部举行的文艺晚会，欣赏了中国的音乐、舞蹈和传统京剧节目。

文化部长黄镇和夫人朱霖，外交部部长仲曦

东，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叶成章等陪同马来西亚贵宾观看了演出。晚会上，东方歌舞团

演出了马来西亚舞蹈“巴叶(拿舞)”、“尼鲁”(魔鼓舞)、“瓦布兰”(风琴舞)，这是他们去年访问马来西

北京大学隆重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蒋南翔同志在讲话中希望六十年前五四运动中起了榜样作用的北大，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学校建设成为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成为新长征中全国学校的榜样。当前必须认真地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精神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四日电 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的一万五千名师生员工今天上午在首都体育馆隆重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四运动时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许德珩出席了大会。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同志致词后，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会上讲了话。他希望六十年前五四运动中起了榜样作用的北大，能够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卓有成效地把学校建设成为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成为新长征中全国学校的一个榜样。他指出，为了搞好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的建设，当前必须认真

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发扬民主，进一步搞好安定团结。

蒋南翔在讲到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出现的大好形势时说，思想解放还远远不够，还必须继续努力克服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况。要解放思想，就要坚持发扬民主。当然，我们今天强调民主，和五四时期大不相同。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辈们火烧赵家楼，是为了打破旧世界；我们今天发扬民主，是为了建设新中国。五四时期提倡的民主，主要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我们今天

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或者叫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个人的自由放任。个人自由放任的极端民主化，导致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蒋南翔强调说，社会上确实有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事业、攻击党的领导的反革命分子。对他们的反革命言论行动，必须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最广大的人们群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爱国人士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然，要真正充分发扬民主也还需要继续努力。现在在刚刚开了一个头，不能说“思想解放过了头，发扬民主过了头”。

亚时向当地艺术家学习的。今晚，他们满怀深情的精湛表演，受到了贵宾们的热情鼓掌欢迎。

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贾拉尔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文艺晚会。

今天下午，侯赛因总理和夫人由外交部副部长韩爱陪同参观了故宫。

蒋南翔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先决的问题是全國范围的安定团结。他勉励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加强团结，艰苦奋斗，把北京大学办好。

教职工代表郑淑惠、学生代表张炜在会上先后发言。他们一致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保证为四个现代化教好、学好，为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而努力，决不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期望。

今天的大会是由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主持的。

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张承先、高晋、黄白平、胡立、刘祖春；在北京大学工作和学习过的区英夫、熊向晖、朱光亚、冯至、周培源；部分北京大学等院校负责人；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外国专家和来校讲学的外国学者。

中央乐团和中央歌舞团为大会演出了文艺节目。

一些不合科学的举动，群众一时未能识破其中的“奥秘”，在所难免，不足为怪。这又一次说明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任务迫在眉睫。

当前，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率领下，摩拳擦掌，向科学进军。我们的领导同志应当带领群众扎扎实实地钻研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发展科学事业，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有的领导同志不懂科学也不要紧，可以老实地向科学家们请教，向一切有学问的人请教，要向外行内行。可是，有少数同志不是这样。他们往往放不下面子，不懂装懂，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见到一些新奇的事，便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也不问是否合乎科学，又是接见，又是鼓励，闹得个大笑话。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搞老一套。要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非有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精神不行。这里既需要千千万万个陈景润、陈懿那样的科学家，也需要金绍朱、李嘉玉那样努力变外行为内行的领导干部。向科学现代化进军，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的领导同志去做：一桩桩一件件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攻克科学城堡组织好“兵马”和“粮草”，要表彰一心攻关的科技人才，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等等。总之，任务繁重，时间紧迫，需要我们苦干、实干，千万不能被那些荒诞无稽的事分散了精力。

在天津，人们传颂着这样一个真实爱情故事，说的是女医生、大学毕业生段肇谊同下肢截瘫、走路靠双拐的残废军人顾伟力，是怎样恋爱结婚、相爱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第二军医大学的女学生段肇谊正在东北解放军二一三医院进行毕业实习。一天，一辆救护车飞快地开到医院，从车上抬下一位重伤员。只见他面色苍白，全身从头到脚都缠满绷带。护送他来的部队领导同志向大夫们介绍说：“他是我们的排长顾伟力。一次在山洞内施工，突然发生了塌方事故，他猛地把身边的战友推出老远，而自己却被石块埋了起来。他全身十五处负伤，最严重的是腰骨骨折，下肢瘫痪。”

站在病床旁边的段肇谊含着泪花听着。顾伟力把生存的希望送给战友，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精神深深地感动着这位实习军医。

一天，段肇谊端着药走进病房，只见顾伟力仰面朝天，双手拿着举重器，咬着牙，一上一下地在进行上肢功能锻炼，汗珠子成串地从他的额上滚落下来。

“多么坚强的战士啊！”病室十几个伤病员，数顾伟力伤情最重，但也数他表现得最坚强，最乐观。他给大家讲故事，唱战歌，说天津快板。在他的带动下，整个病房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段肇谊从内心里敬佩这位英雄战士。

由于长期卧床，顾伟力臀部生了一块褥疮，段肇谊给他勤换药，勤洗衣服，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褥疮治好了。

一次，躺在床上冒出汗来，排不出大便，憋得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周围的病友急得束手无策。这时，段肇谊来到病房，二话没说，用手帮小顾把大便抠出来。从来没有因病痛苦而流泪过的顾伟力，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不久，段肇谊毕业实习结束了，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年轻的实习军医这时想起了很多，也想得很远……。在自己的同学和好友为他的成了了庆贺，有的成了终身伴侣。恋爱，婚姻，崭新的课题摆在二十六岁的段肇谊面前。一个人在紧扣着她的心弦，

他，正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为了保护战友，而成了终生残废的顾伟力。她反复思索着：难道这样的英雄战士不应该得到爱情、得到幸福吗？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以后，这位在高中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姑娘，一天晚上终于在灯下铺开了信纸，毅然将自己的爱情之窗向顾伟力敞开。

躺在病床上的顾伟力，看完姑娘热情洋溢的信，激动得睡不着觉。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身体条件，又冷静下来。他回信表示：我是一个终身残废的人，希望您再三考虑！但得到的回答是：“我已完全考虑好了！”

一个大学毕业的军医，爱上了走路靠双拐的残废人，这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有人说，精神可靠，其实是傻瓜，是可敬不可学的。也有人说，她起码也应该找一个同等资历的人，劝她要慎重对待终身大事，以免将来后悔。可是小

段却不是这样看，她说，“爱情不只是春天的花朵，夏天的冰雪，也还会遇上秋天的泥泞，冬天的冰霜。”社会上的一些非议，并没有影响她和顾伟力之间的爱情。这朵爱情之花，深深扎根于共同理想的土壤中，开得更加鲜艳芬芳。

一九七〇年七月，他俩结婚了，婚后曾到天津看望顾伟力家属的亲人。一直为儿子的婚事而忧虑的老母亲，见到儿子带着这样好的媳妇回来，乐得合不上嘴，逢人就讲：“真是新社会好”，邻居们也赞叹说：“可不是！要是在旧社会，这样的半拉子身子准是一辈子打光棍。”

婚后不久，他俩先后复员回到天津。负责安置工作的领导同志对顾伟力说：“你已经为人类尽了力，立了功，可以在家休养，工资照拿，享受一级荣誉军人的生活待遇。”但顾伟力回答说：“为革命流血牺牲，是共产党员的本分，只要

高 尚 的 情 操

我活一天，就要干一天社会主义事业。”段肇谊也三番五次地找领导上谈。她说：我们结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共同事业的道路上并肩前进。靠国家养活一辈子，这不是我们的理想。

在他们再三要求下，经过部队领导和地方协商，决定把他们两人都安排到第三毛纺织厂工作。两人的共同愿望又一次实现了。顾伟力被分配到财务科工作，大家知道他是一等残废军人，是有功之臣，都主动照顾他。厂里也决定对他的工作不限量，歇班请病假不扣工资，还嘱咐科室同志关心他的生活。可是，顾伟力牢记人民解放的光荣传统，严格要求自己，不论刮风下雨，他总是克服困难，坚持坐着手推车去上班。

他们结婚九年，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做饭、洗衣服、买东西、看孩子，家务负担不轻啊！但爱情使双方都能互相体谅，尽可能地给对方创造工作和学习条件。段肇谊曾经到市里一家大医院进修中医。她的这一行动，得到了顾伟力的热情支持。为了使她能够安心学习，他尽力分担家务，凡是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顾伟力都不让她操心，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等活他都包揽了。最初练习干活时他经常和刚学着走路

的小儿子摔倒在一起。而段肇谊为了减轻顾伟力的负担，不管工作多么忙、多累，她都坚持一早把孩子送到厂里幼儿园，晚上再接回来，中午送到厂里食堂为顾伟力买饭。对这种紧张的生活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烦躁和怨言。经过一年的进修，段肇谊学会了中医经方治疗疾病的方法，为工人健康服务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最近，厂里任命她为保健站站长，工作担子更重了，任务更艰巨了。但他们夫妇之间，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感情仍然那样的和谐，而为人民做出贡献的愿望仍然那样的强烈。

这个爱情的故事，反映出了我们一代先进青年的崇高精神。广大青年在处理婚姻恋爱问题的时候，不是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吗？

新华社记者 孙永盛 丛文瀛

《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司文郎》，说一个瞎和尚能用鼻子判断文章的优劣。无论什么样的文章烧成灰烬，经他一嗅，便见分晓。是好文章，就象闻到奇花异草，馨香扑鼻，沁人脾腑；如果碰到坏文章，瞎和尚则会恶心，“向壁大呌，下气如雷。”故事还说，那时代，瞎和尚嗅过的写坏文章的人金榜题名，写好文章的人反倒落第了。所谓“以鼻嗅文”当然是荒诞无稽的。蒲松龄撰写这个故事，无非是辛辣地揭露和讽刺当时科举制度的腐朽。如果有谁那么认真，硬说瞎和尚的鼻子有什么奇特的功能，并列入科学研究项目，那势必叫人笑掉大牙。

然而，类似以鼻嗅文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仍不时有传闻。前些年，据说有一个女孩能一眼看到埋在地底下几尺深处的钉螺；有个少年用眼睛可以穿过厚墙看到放在隔壁的东西。最近，一些地方又“发现”了几个能够用耳朵认字的儿童，甚至手、脚、肚子也都能认字。其实，所谓“神耳”、“神眼”、“神手”、“神脚”、“神腹”一类，同瞎和尚的“神鼻”一样，都是荒诞无稽的。

以鼻嗅文之类之所以荒诞无稽，是因为它违背了常识，完全是反科学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写的字只能反射可见光，决不会发出什么声音，因而只可用眼看，不能用耳听。人之能够看见字，是由于大脑的视觉中心，得到了由眼、视神经传来的光信号。耳朵与视觉中心之间是没有神经相通的。这

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

祖 甲

是已经为实验所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因此，说什么写的字会发出嗡嗡之声，通过耳朵传入儿童的脑海，“放出光来”，“象银幕一样把字的笔划逐一显现出来”，等等，是荒唐的、反科学的。稍有一点科学常识、而又又不云亦云，是决不会上当的。

用耳朵“听”字的儿童是无辜的。正象瞎和尚以鼻嗅文是那个姓宋的司文郎让他干的一样，“用耳识字”之类的魔术，也是大人吹出来的。单纯、幼稚的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没说什么话，至多出于一点好奇心而已，够不上什么行骗。对于这些天真伶俐的儿童，我们有责任好生引导，使之走上正路，成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有用人才。

奇怪的是个别科技部门的同志和个别领导同志，不请教科学，不请教科学家，看魔术似的表演，居然带头鼓掌，大赞“神耳”，甚至愿有介事地下命令保证这些儿童的营养。这些同志如此缺乏科学常识，不禁令人担心，如不改变这种情况，怎能带领群众为四化奋斗呢？

中国是一个文化科学水平不高的国家。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推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实行愚民政策，致使科学普及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在儿童中出现

一些不合科学的举动，群众一时未能识破其中的“奥秘”，在所难免，不足为怪。这又一次说明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任务迫在眉睫。

当前，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率领下，摩拳擦掌，向科学进军。我们的领导同志应当带领群众扎扎实实地钻研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发展科学事业，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有的领导同志不懂科学也不要紧，可以老实地向科学家们请教，向一切有学问的人请教，要向外行内行。可是，有少数同志不是这样。他们往往放不下面子，不懂装懂，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见到一些新奇的事，便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也不问是否合乎科学，又是接见，又是鼓励，闹得个大笑话。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搞老一套。要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非有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精神不行。这里既需要千千万万个陈景润、陈懿那样的科学家，也需要金绍朱、李嘉玉那样努力变外行为内行的领导干部。向科学现代化进军，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的领导同志去做：一桩桩一件件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攻克科学城堡组织好“兵马”和“粮草”，要表彰一心攻关的科技人才，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等等。总之，任务繁重，时间紧迫，需要我们苦干、实干，千万不能被那些荒诞无稽的事分散了精力。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北京军阀政府在全国革命运动的压力下，下令释放所有被捕学生，又于六月十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恢复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约签字。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做微薄的离所，结果使他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中国拒绝签字的电讯传出，帝国主义各国十分震惊。这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初步成果。

三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的运动也开始了它的分化，“分成两个潮流。一部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这种分化在全国各地都有反映。

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斗争的实践，在李大钊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许多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心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我自己就是在李大钊同志的直接影响下，经过学习，逐渐进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斗争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国内的如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等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起来，而导致了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国外，主要在法国，以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为首的赴欧勤工俭学的共产主义者，为宣传马列主义，为我党培养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开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胡适，把自己装扮成新派，钻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打着破革命的勾当。共产党知识分子要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改造中国；但胡适却宣扬“点滴改良主义”。共产党知识分子要走俄国人的路；但胡适则直接或间接地鼓吹苏维埃制度，主张俄国继续作帝国主义的前席。我们要爱国，胡适则蔑视我们“排外”，硬说“帝国主义是不存在的”。他更猖狂无耻地胡说：中国人自己是治理不好中国的，只有让洋人管理中国五十年，然后交给中国人，如邮政、海关不是由洋人管理好的吗？胡适这种胡言乱语表明，开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来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忠实代言人。胡适抵制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谬论，终究被革命的洪流所冲倒。

此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还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等。他们在爱国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也曾沉湎泛起，故作几许变态。段锡朋是《国民杂志》社成员，在众多学生被捕时，曾主持过北京大学学生会，并当选过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是《新潮》社的成员。“五四”那天，罗家伦曾代表示威群众向外国使团递英文说帖。可是，由于他们跟在胡适后面转，投其所好，一心追求读书做官，因此，运动刚一过去，就立即暴露出丑恶“五四”精神的丑恶嘴脸。罗家伦恶毒污蔑爱国学生运动是一种“冲动”，胡说“牺牲”了学业去反帝反封建是最不合算的，等等。随后，这几个人在胡适、蒋梦麟的支持下，用十万元银资助

到国外镀金去了，最后都成为国民党的党棍、社会残渣。

五四运动后期，知识分子队伍分化的情况表明，两种结果，两种后果。我国人民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十月革命的道路为榜样，我国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一九二一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时代前进了，但是五四运动这种彻底革命精神是永放光芒的。

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抓住了这个主要任务，就是把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坚持还是背离这四条基本原则，决定着我们的这一代和子子孙孙的命运。今天，我们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百折不挠地坚持这四条基本原则，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一切力量。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发扬超越国境自卫还击作战中我边防部队表现出来的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中，奋勇前进！

